

Understanding the double-embeddedness in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Findings based on a five-province survey in China

Narisong Huhe¹ and Jie Chen²

¹ Department of Politics,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Glasgow, UK

² Graduate School,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Virginia, USA

Abstract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amin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China.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embeddednes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given the particular reform environments,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are face “double-embeddedness”: a government-driven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a market-driven economic embeddedness. Based on data from a five-province survey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we find the survey enterprises vary significantly across these two forms of embeddedness, and they seem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Generally, large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eurs who had worked in government tend have higher levels of political embeddedness.

我国政商关系中的双重嵌入及其解释： 基于沿海五省私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呼和那日松*

Jie Chen†

摘要

本研究试图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私营企业政商关系的差异性。通过使用嵌入性这一概念，本研究提出，由于我国独特的经济发展实践，私营企业处于一个独特的双重嵌入的环境中：以政府为主导的嵌入性与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性。通过对我国沿海五省私营企业的代表性抽样调查以及分析，本研究发现这两种嵌入性不仅在其经济以及组织参与维度上存在较高差异性，同时也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总体而言，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创业前曾在机关工作的私营企业主更看重以政府为主导的嵌入性。

关键词：政商关系、嵌入性、私营企业、实证研究

1 引言

自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以来，私营企业（包括“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在我国经济中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变化之一。1978年，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仅14万人，至2007年，我国个体工商户增长达2741.5万户，私营企业增长至551万户，合计注册资金总额高达近20万亿元。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不仅已成为我国

*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email: nnarisong.huhe@strath.ac.uk。

†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Email: chen9jx@jmu.edu。

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我国就业增加的主要渠道。总体看来，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就业量现在已占全国非农就业总数的80%左右 (Chen 和 Dickson, 2008)。

私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促使了我国政商关系的重新调整。首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其次，从法律框架的角度，2004年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对宪法的修正案，其中具体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最后，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关于全面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党和国家关于私营经济的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不仅标志着我国政商关系的重要调整，同时也表明如何协调好政商关系对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其理论以及政策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我国私营企业政商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这些研究对私营企业主理解政商关系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是，由于大多是基于一个城市、某个特定产业、或者专注于相对大型企业，这些研究还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私营企业政商关系的系统性结论。此外，政商关系不仅包含私营企业与政府不同部门间经济关系，同时涵括各类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对全面研究我国的政商关系也提出了巨大挑战。

¹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推进公平准入,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以一项从2006年底到2007年初在我国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广东——进行的对民营企业家的代表性社会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见第四节），希望通过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各种规模的民营企业的整理与分析，为我国政商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些实证性结论。

2 政商关系与嵌入性

政商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外学者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对西方政治经济发展路径的研究，大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政商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早期与晚期阶段会体现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Moore (1966) 对英法等国发展进程的分析表明，在“先发展国家”（early industrializers）中，政商关系往往体现出较高的冲突性，表现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挑战原有的封建或专制国家。这一结论在 Rueschemeyer 等 (1992) 进行的更系统性的研究中得到再次确认。Rueschemeyer 等 (1992) 发现，即使是在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由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运动中，商业阶层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很多时候工人阶级都与商业阶层建立了政治联盟，以推进共同的政治诉求。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Gerschenkron (1962) 以及 Bellin (2000, 2002) 对“后发展国家”（late developers or industrializers）中的政商关系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后发展国家中的商业阶层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竞争环境，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业已被早发展国家占领国际以及国内市场。这一不对称的竞争关系促使商业阶层寻求国家在资本、政策等各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后发展国家政府出于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稳定的考虑，也往往乐于对商业阶层提供各种支持。因此，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独特的结构性因素，使得这些国家中的政商关系很少表现出冲突性，而往往体现出商业阶层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dependence）。

虽然我们很容易在跨国、宏观的层次上理解后发展国家中商业阶层对政府的依赖性，但是当聚焦于一个特定的国家，我们又应该如何从微观层面——尤其是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具体地研究政商关系呢？Granovetter (1985); Granovetter (1992); Granovetter (2005) 提出的“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为我们研

究微观层面的政商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视角。嵌入性具体是指，个人或某个社会经济实体从事的活动（如，私营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孤立的现象。相反，这些活动是“嵌入”在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取决于该个人或社会经济实体的所处的关系结构，嵌入性的程度会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嵌入性可以被用来揭示个体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差异性，从而有助于推进我们对政商关系微观层面的理解。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高的独特性，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国外对嵌入性的研究。因此，我们需要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确定中国私营企业嵌入性的具体维度。

3 政府与市场双重嵌入下的中国私营企业

对我国改革开放历程的回顾不难揭示，我国私营部门的发展是与党和国家的各种支持分不开的。私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私营经济“承认”以及“鼓励”的结果。因此，当考察我国私营企业嵌入性时，以政府为主导嵌入性（state-oriented embeddedness）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其次，我们也需要注意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成熟以及私营部门的壮大，私营企业会逐渐形成如行业协会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嵌入性（market-oriented embeddedness）。在这一节余下的部分里，我们将分别描述我国私营企业面对的这两类嵌入性。

3.1 以政府为主导的嵌入

从狭义的角度上来看，政商关系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嵌入性。正如引言中指出的那样，该种嵌入性涵盖了多种复杂的关系。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两个维度：经济维度和组织参与维度。虽然这两个维度并不能涵盖以政府为主导的嵌入性的所有方面，但我们认为他们足以揭示该嵌入性的核心特征。

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众多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指出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是理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e.g., Yang, 2004; Zheng, 2005)。以对我国农村工业化的研究为例，这些研究指

出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鼓励甚至是直接参与，我国农村经济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的。Oi (1999) 进一步将地方政府与企业间形成的这种在经济发展中紧密合作关系称为“地方伙团主义 (local state corporatism)”。对于这种紧密的政商合作关系的形成，学界提出了从社会学到文化学的不同解释。这里，我们只讨论一些核心制度性以及结构性解释。一方面，从地方政府角度上看，由于财政分权与官员考核的双重激励，地方政府对于鼓励以及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强烈的愿望。发展良好的私营企业不仅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而且能充分体现地方官员的管理能力，从而有助于其职业晋升。另一方面，从私营企业主的角度上看，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并不够完善，私营企业缺乏其他有效的渠道获取必要的资源（如，资本与技术）。而地方政府却可以通过政府网络为私营企业提供这些资源（冯天丽和井润田，2009；于天远和吴能全，2012；于蔚等，2012）。而且，在很多生产领域，私营企业还面临着与国有企业共同竞争的局面（罗党论与刘晓龙，2009；张敏等，2010）。此时地方政府的支持将有效弥补私营企业较国有企业的劣势。因此，与各级政府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是私营企业主在我国市场经济结构下的理性选择。

除了经济维度的紧密合作，以政府为主导的嵌入性还体现在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参与层面 (e.g., Ma 和 Cheng, 2010)。随着我国私营部门的快速发展，如何更好地鼓励与引导私营企业主参与到我国的社会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成为在新时期党和政府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在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之后，我国对鼓励和引导私营企业主的制度性参与有了系统性的进步。具体包括，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鼓励参选人大选举、推荐提名政协委员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加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这是因为，与其他全面包容性的组织不同，工商联的功能和目标非常集中，即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这一特性使得工商联能够非常有针对性地团结、服务、以及引导私营企业主，因而也成为私营企业主组织参与层面最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对应于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和鼓励，众多研究也表明，私营企业主本身对政府主导组织参与的意愿也十分强烈 (e.g., Chen 和 Dickson, 2010; Dickson, 2008; Wright, 2008)。这不仅有助与各级政府官员维持良好关系，更重要的是，私

营企业家的此类组织参与能更集中、有效的反映他们在经营与发展中遇到的与政策相关的问题，从而有助于私营部门的长期发展。

3.2 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

私营企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经济实体，因此过分强调与政府的关系会使我们忽略其嵌入性的另外一个方面，即，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性。这一类嵌入性主要指私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其他非官方的经济实体形成的关系。与上一部分相对应，我们这里也聚焦于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性的经济维度和组织参与维度。

首先，从经济维度上看，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生产要素的充分流通、以及公平准入的扩展，私营企业对各级政府支持的需求会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因为，在这一市场条件下，即使没有政府的支持与干预，私营企业家也可以通过其商业合作伙伴获得得所必需的资源。由市场主导的、与商业合作伙伴形成的网络关系成为了私营企业家们互动的主要目标。除了市场的推动作用，这类嵌入性变得更加重要的原因还来自于一些政府内部的因素。由于很多地区官员流动性很高，其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也不近相同，这就对私营企业家维持稳定的发展环境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冯天丽和井润田，2009；于天远和吴能全，2012）。同时，与政府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也需要投入时间等各种成本。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将促使私营企业家增加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性。以私营企业发展中一项最重要的资源——资本——为例，研究者们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相对落后，很多的私营企业都受限于资本而无法扩大发展。随着金融系统的渐趋成熟，非国有金融机构已成为私营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Tsai, 2004, 2005, 2007；于蔚等，2012）。

相对应于经济活动中的合作，私营企业家们也逐步形成了各种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家间的组织。其中作用最明显、影响最广泛的莫过于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如，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等）。这类组织都试图通过非政府的手段来协调行业内部以及不同行业间的关系。首先，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建立行业规定来规范协会成员的经营行为，其次，行业协会可以通过会计、审计手段对协会成员经营活动加以监督与管理。最后，行业协会还可以通过提供各种服务来维护协会成员的利益、促进其发

展。如，很多行业协会都对成员提供信息咨询、发布统计资料。还有，很多商业协会还可以提供法律服务，如温州打火机协会成功地组织了成员企业对欧盟反倾销的WTO抗辩，有力的维护了我国打火机产业的权益。

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私营企业处于一个独特的双重嵌入的环境中，这是由我国特殊经济发展实践决定的。那么，我国的私营企业以政府为主导与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性究竟程度如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私营企业间这两类嵌入性的差异？最后，这两类嵌入性之间究竟是竞争性还是替代性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对我国私营部门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余下的部分里，我们希望能够使用实证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回答。

4 数据

这篇文章使用的数据是来源于2006年底和2007年初之间，在我国私营部门最发达的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进行的一项调查。这次调查旨在全面了解不同规模、类型、以及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私营企业。调查期间，私营企业主是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策略来筛选的。在第一阶段，对每一个省所有县级单位（县、县级市、以及城区，以下统称县）进行分层。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GDP），这些县被分为“高”、“中”、“低”的发展水平，然后在每个发展水平同等数量的县被随机选取。在这一采样阶段，共有40个县被选中。在第二个阶段，在每个选定的县，分别位列根据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水平进行排序，并将其分组为工业或商业部门（如，制造、运输、零售、餐饮服务），之后在各主要部门随即抽取数量大致相等的大型、中型、以及小型企业。第二采样阶段共选取了2300家企业。在最后阶段，对每个选定的企业进行了实地访谈。访谈的对象只限于的私营企业主或者主要投资者之一。在本次实地调查，共发出问卷2300份，完成2072份，问卷完成率为90%。

4.1 私营企业主的社会人口特征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我们首先可以了解私营企业主的社会人口特征。这些特征都会对私营企业的嵌入性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表(1)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受访的私营企业主为有农村背景的、受到过一般教育水平的中年男子。具体地，受访的私营企业主中，男性占绝大多数（近90%）；平均年龄为44岁，即大多出生在六十年代左右；大部分私营企业者，约五分之四，有农村背景。受访的私营企业主大部分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只接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下的正规教育，仅23%的私营企业主完成了大学教育，而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不到50人（1.3%）。从政治面貌上看，大约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主是党员。

表 1: 私营企业主的社会人口特征

	有效样本数	类别与统计值	
性别	2071	男	1831 (88.4%)
		女	40 (11.6%)
年龄	2052	均值 = 44.0	标准差 = 7.6
教育程度	2045	初中及以下	526 (25.7%)
		高中和中专	1021 (49.9%)
		大学	471 (23.0%)
		研究生	27 (1.3%)
政治面貌	2072	中共党员	743 (35.9)%
		其他	1329 (64.1%)
出生地	2015	城市	422 (20.9%)
		农村	1593 (79.1%)
创业背景	2072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277(13.4)%
		其他	1795 (86.6%)

最后，本次调查还了解了私营企业家们创业前的工作背景。根据 Dickson (2003, 2007, 2008) 以及 McNally 和 Wright (2010) 等人的研究，私营企业主“下海”前的背景对其企业的经营以及长期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大约一成半的私营企业主是由党政机关以及事业单位干部下海产生的。

4.2 私营企业的社会经济属性

与私营企业主的社会人口特征同样重要的是私营企业本身的社会经济属性。表(2)汇报了被调查企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不难发现，我国私营企业内部是存在着巨

大差异的，无论是从企业资产规模还是企业雇用人数上来看。具体的，从企业人数上看，最小的被访企业只有十几名员工，而最大的则超过了五万人，二者相差上千倍。更大差异在资产上也有充分体现。民营企业内部的巨大差异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私营企业主看成是简单的一类阶层，其内部分化是非常显著的。

表 2: 私营企业的社会经济属性

Statistic	有效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人数	2067	225.3	1458.9	12	53714
企业资产 (万元)	2045	4257.9	8067.7	1.0	81926.0
地域	2072	山东	N. = 400	(19.3%)	
		江苏	N. = 469	(22.6%)	
		浙江	N. = 402	(19.4%)	
		福建	N. = 400	(19.3%)	
		广东	N. = 401	(19.4%)	

表(2)还汇报了被调查私营企业的地域分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此次调查采用了多阶段随机抽样的策略，所以不同地域被访的私营企业数量大体一致（约400家左右）。我们并不能以此来推断私营企业实际的地域分布，因此本文中对地域的讨论将只限于差异性比较。

5 私营企业双重嵌入的实证探索

我们对私营企业双重嵌入的实证探索将分三步展开。我们首先介绍如何对双重嵌入的两个维度进行操作化，并通过调研数据简单比较私营企业两种嵌入性。之后，我们分别研究是那些因素影响了双重嵌入的经济维度与组织参与维度的原因。

5.1 双重嵌入的经济与组织参与维度

如何定量地私营企业政府嵌入与市场嵌入的经济维度呢？本研究使用私营企业主对融资难易程度以及私营企业实际的融资渠道作为量化指标。首先，由于资本要素是私营企业发展最核心的资源，因此对资本获取难易以及资本获得渠道的考察最能解释不同嵌入性在经济维度上的差异。其次，由于对私营企业嵌入性实证研究的

相对缺乏，并不存在统一的衡量政府以及非官方主体对私营企业经济介入的指标。由于不同的私营企业对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存在这巨大差异，所以当考虑到对较大数量的私营企业研究时，融资难易及方式成为所能获得的最优的量化指标（冯天丽和井润田，2009；罗党论与刘晓龙，2009；张敏等，2010）。最后，本研究对私营企业经济嵌入性的量化指标既包括了私营企业家的主观评价，也包括了私营企业的客观融资渠道。这两种指标的同时应用将会弥补各自的不足，从而为我们提供较为可靠的实证结果。具体地，我们使用了如下几个问题：“现在您的企业如果需要资金，整体来讲筹集资金困难么？”；“您的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困难么？”；“您的企业一般有没有从国有银行贷款？”；“您的企业一般有没有从国有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贷款？”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调查中本研究强调国有银行既包括狭义上的由国家（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直接控股并为第一大股东的银行，²也包括广义上的由国有法人单位（即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为第一控股股东的银行。³

相比较于经济维度，对私营企业组织参与维度的操作化相对较为直接。正如我们在第三小节讨论过的那样，私营企业组织嵌入性既包括以政府为主导工商联，也包括以市场为主导的行业协会。因此，我们直接调查了被访企业是否参加了这两个组织。同时，为了更好地考察私营企业的组织参与嵌入性，本研究还调查了私营企业内部是否成立有党支部。

² 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共 8 家。

³ 包括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 7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表 3: 双重嵌入的经济与组织参与维度

	有效样本数	类别与统计值	
融资难易 [整体]	2060	不困难 (1)	229 (11.1%)
		不很困难 (2)	618 (30.0%)
		有点困难 (3)	914 (44.4%)
		非常困难 (4)	299 (14.5%)
融资难易 [国有银行]	2031	不困难 (1)	211 (10.4%)
		不很困难 (2)	502 (24.7%)
		有点困难 (3)	831 (40.9%)
		非常困难 (4)	487 (24.0%)
融资渠道 [国有银行]	1920	有	658 (34.3%)
		无	1262 (65.7%)
融资渠道 [其他]	1909	有	1358 (71.1%)
		无	551 (28.9%)
工商联	1974	参加了	701 (35.5%)
		未参加	1273 (64.5%)
行业协会	1821	参加了	1109 (60.9%)
		未参加	711 (39.1%)
党支部	2058	有	631 (30.7%)
		无	1427 (69.3%)

表(3)汇报了本研究对私营企业双重嵌入的经济与组织参与维度考察的描述性结果。由这些统计，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首先，大部分的被访企业都存在这一定的融资问题，而且这一现象在向国有银行贷款问题尤为突出。从融资整体情况的评价来看，只有略高于四成的企业认为筹集资金“不很困难”或“不困难”。具体到从国有银行贷款，认为“不很困难”或“不困难”的私营企业降到了三分之一左右，而认为“非常困难”增长到将近四分之一。

其次，从融资渠道上看，我们发现私营企业在选择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一方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一般会从国有银行贷款。另一方面，从国有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贷款的私营企业数超过了被访企业总数的七成。这一发现证实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私营企业的经济嵌入性正越来越导向市场一边，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借助国有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

最后，在组织参与的维度上，以政府为导向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嵌入性也存在着巨大的程度差异。具体地，调查结果显示，至于约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参加了工商联，三成的企业成立了党支部。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超过六成的私营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协会。这一结果说明，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性已成为大部分私营企业的主要关注点。这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私营企业正越来越多的通过私营企业间的网络结构来协调经营行为。

总而言之，对私营企业双重嵌入性的考察说明，以政府为主导嵌入性与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性，无论是在经济维度上还是在组织参与维度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呢？我们下面将对这两个维度差异的成因分别进行讨论。

5.2 解释企业融资的难易与渠道

本研究认为有三类因素会显著影响私营企业主对融资难易的主观判断以及私营企业的实际筹资渠道。(1)私营企业家社会人口特征：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人口特征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会对私营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本研究此类特征具体包括私营企业主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出生地、以及创业背景。(2)私营企业的社会经济特征：私营企业本身的规模也会深刻的影响其经营行为。(3)企业地域：我国历史以来就存在巨大的地区间差异，各地区不仅在自然禀赋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政策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也不尽相同。表(4)汇报了我们使用这三类自变量来解释私营企业融资难易以及渠道的结果。

表 4: 关于私营企业融资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融资难易 [整体]	融资难易 [国有银行]	融资渠道 [国有银行]	融资渠道 [其他]
	(1)	(2)	(3)	(4)
性别 ^a	0.288** (0.136)	0.406*** (0.139)	-0.108 (0.173)	0.112 (0.176)
年龄	-0.005 (0.006)	-0.004 (0.006)	0.012 (0.008)	-0.014* (0.008)
教育程度	-0.081 (0.067)	-0.092 (0.066)	0.217*** (0.083)	-0.204** (0.084)
政治面貌 ^b	-0.174* (0.097)	-0.301*** (0.097)	0.104 (0.121)	-0.086 (0.124)
出生地 ^c	0.139 (0.113)	-0.088 (0.112)	0.872*** (0.135)	-0.976*** (0.135)
创业背景 ^d	-0.089 (0.132)	-0.217* (0.128)	0.079 (0.159)	-0.130 (0.161)
log(企业人数)	-0.226*** (0.048)	-0.297*** (0.048)	0.297*** (0.060)	-0.265*** (0.061)
log(企业资产)	-0.003 (0.037)	-0.054 (0.036)	0.210*** (0.046)	-0.115** (0.046)
地域 ^e				
江苏	-0.883*** (0.135)	-0.628*** (0.130)	-0.676*** (0.170)	0.384** (0.176)
浙江	-1.991*** (0.141)	-1.443*** (0.137)	-0.114 (0.169)	-0.133 (0.175)
福建	-1.263*** (0.146)	-0.636*** (0.141)	0.170 (0.177)	-0.202 (0.185)
广东	-1.022*** (0.146)	-0.839*** (0.144)	0.449** (0.178)	-0.446** (0.184)
常数 ^f			-4.380*** (0.449)	4.122*** (0.457)
样本数	1936	1910	1807	1796
Log Likelihood			-1029.6	-988.7
AIC			2085.2	2003.4

Note: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模型 (1) 与 (2) 为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 模型 (3) 与 (4) 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

^a 男 = 1; 女 = 0。

^b 中共党员 = 1; 其他 = 0。

^c 城市 = 1; 农村 = 0。

^d 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 1; 其他 = 0。

^e 山东为对照组。

^f 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 (1) 与 (2) 中的分类数见作者网站。

从表(4)的分析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从私营企业家对融资难易的主观判断来看, 对整体筹资情况以及从国有银行贷款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

两种主观评价共享绝大部分的解释变量。具体地，位于山东省境内的、雇用人数较多的企业的女性党员私营企业主会认为，无论是整体筹资还是从国有银行贷款都较为容易。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评价还存在着一点不同，即，下海创业前为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干部的私营企业主相对认为从国有银行贷款较为容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这一创业背景对其关于整体筹集资金的评价却没有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私营企业主的创业背景确实会对其融资产生影响，至少是主观层面的。

更为值得重视的发现是关于实际融资渠道的。对比影响从国有银行贷款和从其他渠道筹资的因素，我们会发现其影响几乎都是相反的。关于私营企业家社会人口特征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出生地为城市的企业家更多的会从国有银行贷款，与之相对的是，那些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出生地为农村的年轻企业家会更依赖国有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筹集资金。类似的反差也出现在私营企业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上。一方面，人数较多、资产较大的私营企业更可能从国有银行贷款。另一方面，人数以及资金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可能从其他渠道贷款。

地域的差异在具体的融资渠道上显得较为复杂。浙江与福建两省首先与对照组山东省并没有任何显著性差异。相对于山东的私营企业，江苏的私营企业更多地会从国有银行以外的渠道贷款，而较少地依赖国有银行。广东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其私营企业更可能从国有银行贷款，而非其他渠道。

对私营企业融资难易以及渠道的实证分析显示，私营企业主的创业背景是导致私营企业主对融资难易的主观判断差异性的最主要的因素。而私营企业的实际筹资渠道则体现出非常高的互补性，即，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所面向的私营企业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5.3 解释组织参与和嵌入

与上一部分类似，本研究认为私营企业家社会人口特征、私营企业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企业的地域同样会显著影响私营企业的组织参与和嵌入。表(5)汇报了实证分析的结果。

表 5: 关于私营企业组织参与和嵌入的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变量		
	工商联 (5)	行业协会 (6)	党支部 (7)
性别 ^a	0.019 (0.160)	0.344** (0.161)	-0.282 (0.207)
年龄	-0.025*** (0.007)	-0.015** (0.007)	0.017* (0.009)
教育程度	-0.310*** (0.083)	-0.315*** (0.082)	0.327*** (0.096)
政治面貌 ^b	-0.118 (0.119)	-0.031 (0.117)	1.762*** (0.132)
出生地 ^c	0.051 (0.136)	-0.003 (0.138)	0.126 (0.164)
创业背景 ^d	0.517*** (0.158)	0.252 (0.159)	0.028 (0.175)
log(企业人数)	0.178*** (0.059)	-0.129** (0.059)	0.592*** (0.071)
log(企业资产)	0.156*** (0.045)	-0.180*** (0.046)	0.234*** (0.054)
地域 ^e			
江苏	-0.694*** (0.154)	-0.645*** (0.161)	-0.021 (0.184)
浙江	-1.251*** (0.166)	-0.851*** (0.169)	0.014 (0.191)
福建	-1.343*** (0.177)	-0.702*** (0.184)	0.051 (0.204)
广东	-0.769*** (0.162)	-0.749*** (0.173)	-0.969*** (0.237)
常数	3.725*** (0.435)	3.722*** (0.431)	-6.909*** (0.557)
样本数	1796	1715	1935
Log Likelihood	-1100.2	-1069.5	-820.8
AIC	2226.3	2165.1	1667.7

Note:

* $p < 0.1$; ** $p < 0.05$; *** $p < 0.01$

^a 男 = 1; 女 = 0。

^b 中共党员 = 1; 其他 = 0。

^c 城市 = 1; 农村 = 0。

^d 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 1; 其他 = 0。

^e 山东为对照组。

从表(5)的分析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 我们发现影响私营企业加入工商联、行业协会、以及企业内部成立党支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发现了一些类似于上部分中互补性的存在。具体地, 我们发现那些企业员工较多,

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是工商联的成员，而那些小企业会更积极地加入行业协会。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地域对私营企业加入工商联和行业协会有着类似影响，教育程度相对不高的年轻私营企业家更可能会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而且山东省的这两类组织的参与率要远高于其他地区。

当比较私营企业参与工商联与行业协会这两类组织是，一个需要强调的影响因素是私营企业家的创业背景。一方面，下海创业前为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干部的私营企业主相对更可能是工商联的成员。而另一方面，这一创业背景对其是否参与行业协会却没有任何显著影响。这说明，具有一定政府机关工作背景的私营企业者更倾向于参与到以政府为主导的行业组织中来。

最后，分析结果显示，私营企业内部成立党支部与其是否加入工商联存在着较大的一致性。即，那些企业员工较多，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可能成立党支部，并加入工商联。而且私营企业主本身如果是党员，党支部成立的可能性更高。与对工商联以及行业协会的影响不同，地域对私营企业内部成立党支部表现为，广东省的私营企业相对于其他地区党支部更少

通过嵌入性组织参与维度的分析，我们发现有三个核心因素影响了政府为主导嵌入性与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性在组织参与方面的差异性，那些人员与资金规模较大的企业、创业前曾在机关工作的私营企业主更倾向于参与到以政府为主导的组织参与中来。

6 结语

本研究试图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来研究私营企业政商关系的差异性。通过使用嵌入性这一概念，本研究提出由于我国独特的经济发展实践，私营企业处于一个独特的双重嵌入的环境中：以政府为主导的嵌入性与以市场为主导的嵌入性。通过对我国沿海五省私营企业的代表性抽样调查以及分析，本研究发现这两种嵌入性不仅在其经济以及组织参与维度上的存在较高差异性，同时也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总体而言，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创业前曾在机关工作的私营企业主更看重以政府为主导

的嵌入性。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现有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从理论角度上，区别于大多数强调纵向的私营企业政治联系，本文强调政商关系内在的复杂性。政商关系不仅包括直接纵向上的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嵌入，还包括私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其他横向上非官方的经济实体形成的关系。双重嵌入性更好地揭示了私营企业在我国特殊市场环境下面对的复杂政治经济网络。其次从实证角度上，本文在大规模调查中使用了更加细致的企业政治与经济联系的测量。区别于很多的以上市公司数据为主的研究，本文能更好地展示中小型企业状况。

参考文献

- Bellin, E. (2000). Contingent Democrats: Industrialists,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Politics*, 52(2), 175-205.
- Bellin, E. (2002). *Stalled Democracy: Capital, Labor, and the Paradox of State-Sponsored Develop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 & Dickson, B. J. (2008).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Dec.), 780-804.
- Chen, J., & Dickson, B. J. (2010).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Capitalis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ickson, B. J.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ckson, B. J. (2007). 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The China Quarterly*, 192(Dec.), 827-854.
- Dickson, B. J. (2008).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anovetter, M. S.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 Granovetter, M. S. (1992).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35(1), 3-11.
- Granovetter, M. S. (2005).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1), 33-50.
- Ma, W., & Cheng, J. Y. S. (2010). The Evolution of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in China: Patterns and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7), 891-911.
- McNally, C. A., & Wright, T. (2010). Sources of Social Support for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Order: The 'Thick Embeddedness' of Private Capital Holde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3(2), 189-198.
- Moore, B.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Oi, J. C.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eschemeyer, D., Stephens, E. H., & Stephens, J.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sai, K. S. (2004).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sai, K. S. (2005).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9), 1130-1158.
- Tsai, K. S. (2007).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T. (2010).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D. L. (2004).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eng, Y. (2005).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Central-Local Relations in China: Evolving Research.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2), 240-269.
- 冯天丽, 井润田. 制度环境与私营企业家政治联系意愿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 08:81-91, 123.
- 罗党论, 刘晓龙. 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09, 05:97-106.
- 于天远, 吴能全. 组织文化变革路径与政商关系——基于珠三角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 08:129-146, 188.
- 于蔚, 汪淼军, 金祥荣.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J]. 经济研究, 2012, 09:125-139.
- 余明桂, 回雅甫, 潘红波. 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 经济研究, 2010, 03:65-77.
- 张敏, 张胜, 王成方, 申慧慧. 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0, 11:143-153.